



# 中国人文田野

第三辑

◎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封面人物：汪宁生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出版集团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 中国人文田野

第三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文田野·第三辑 /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9

ISBN 978-7-80752-436-6

I. 中… II. 西… III. 历史地理-考察-中国-文集 IV. 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1272号

# 中国人文田野·第三辑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 特约编辑 万良华  
责任编辑 谭晓红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285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2-436-6  
定 价 30.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 (028) 84122206



# 编委会

## 编委会顾问 (按姓氏笔画数排名)

于希贤 李学勤 李绍明

汪宁生 邹逸麟 周伟洲

##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数排名)

王振忠 王 然 王川平 王建新 尹绍亭

朱士光 朱圣钟 华林甫 孙 华 刘志伟

李孝聪 李并成 陈星灿 陈春声 张诗亚

郑振满 杨圣敏 侯甬坚 荣新江 胡阿祥

赵世瑜 唐晓峰 郭声波 徐少华 葛剑雄

景 爱 鲁西奇 蓝 勇 黎小龙 霍 巍

主 编 蓝 勇

编辑部主任 朱圣钟



# 目录

## 田野学者风采

002 跋山涉水觅新知

——谈我的民族考古学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

汪宁生

## 田野学术考察

030 河西考察记

陈其泰

047 米脂县姬家沟、贺寨则、年家沟实地调查

王 晗

057 层峦叠嶂 四塞之固 五方杂处

——记傥骆道之华阳古镇

林昌文

068 贵州绥阳南宫木厂访寻记

陈季君

075 跳动在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音符

——贵州黎平黄岗侗族的传统生计调查

罗康智

086 南宋四川地区山地城堡考察记

易 宇

102 鲁西南、苏北田野考察记

朱继平 唐晓峰 刘寅春

128 二次葬的民族考古学观察

——河南偃师灰嘴村葬俗小记

陈星灿

## 中外田野学术交流

136 洪都拉斯田野考古点滴

宋江宁 杨 睿

154 2008年滇铜京运路线考察纪实

金兰中 狄森风 罗汉斯著 李文青译





田野学者风采

## 跋山涉水觅新知

——谈我的民族考古学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

汪宁生

作者简介

汪宁生，江苏灌云县板浦镇人，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云南民族大学考古学和民族学教授，民族研究首席科学家。从事民族学及考古学研究四十余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著作丰富，重要论著约100万字，大都收入《汪宁生论著萃编》(上下)，受到国内外同行赞许。曾获美国著名的罗氏奖金。曾受聘担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和美国费城人类问题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被列入《世界杰出人物索引》、《世界五千名人录》和《中国文化名人大词典》。



时光如流水逝去，我来云南工作不觉已有四十余年。由于工作数易，研究方向涉及好几个领域，如崖壁艺术之研究、南诏大理国诸城址之考察、云南考古材料之综合整理（特别是对云南青铜器之考释和研究）、西南民族史之研究等等。但自己始终认为毕生所做最有意义的工作乃是利用民族学资料对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上问题进行的新的探索，或能纠正古人之陈说，或能冲破今人之误区，正是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常引起国内外注意，为人所引用。

迄今为止，已出版论文集四种、专著四种、译著一种、日记两种。大部分著作已编成《汪宁生论著萃编》出版<sup>①</sup>。

<sup>①</sup> 汪宁生：《汪宁生论著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先哲告诫我们，人之为学及修身应该“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俯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sup>①</sup>。今后还应继续努力，再做一些自己想做且有利于学术的事情，但毕竟年近八旬，来日无多，已不可能做更多的研究工作。特别是要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已非力所能及，应该说《汪宁生论著萃编》的出版已标志着自己学术生涯告一段落。

应朋友邀约写出自己毕生经历。这正好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反思走过的道路，谈一些民族调查工作的苦与乐，总结一下经验和体会。假如其中能给人以启示，我将感到高兴和欣慰。

### 一

今天人们已知道利用民族学资料对考古发现的遗物和遗迹进行合理解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也有少数人盲目反对，如张忠培），在西方早已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这就是民族考古学。但当我开始进行民族调查时，当时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绝，信息不通，资料匮乏，对此是毫无所闻。我走上这条道路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经历过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

1960年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奉派参加由全国人大统一领导的云南民族调查组，这时我对民族调查毫无兴趣，总感到学非所用，不能从事考古工作是个遗憾。当然有时也可以就地面文物或遗物做一些调查工作，但收获甚微。1961年10月10日日记写道：

自思参加民族调查组已一年有半，不能发掘则无考古可言，徒然四处乱跑，长此以往将成为废物。

当时几乎是所到之处有什么就调查什么，从喇嘛寺到特殊的婚姻制度，但研究考古学和中国古史的夙愿始终未曾泯灭，兴趣仍浓，时常翻阅有关书刊聊以自娱。

有一次看到顾颉刚先生抗战期间在昆明写成的《浪口村随笔》<sup>②</sup>，心胸突然开朗起来。顾先生用藏族、白族招赘习俗，证明古代赘婿实与奴隶无异；用傣族、苗族丢包习俗，说明内地抛彩球择婿之风的由来。考证“披发左衽”，以蒙、藏人民服饰作为实例。解释《老子》中“乌狗”一词，以喇嘛庙中酥油偶像作为比喻。主张“傻瓜”一词得名于“瓜州之戎”，“吹牛”、“拍马”为西北方言，以黄河、柳江上所见的连舟搭桥解释古代的“造舟为梁”；以四川、湖南民间住宅的天窗说明古代“中雷之制”等等。我才知道原来边疆少数民族保存的文化习俗，甚至残留于内地偏僻地区民俗学资料，到了顾先生手中都有用处，他能随手拈来，用以考证古代的问题。自己现在长年生活在少数民族之中，接触的“奇风异俗”更多，为什么不能用以研究考古学和中国古史问题呢？而且研究任何学问，贵在发现新的材料。记得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读过傅斯年先生一篇文章，大意说是一种学问若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扩张便退步。他还以打油诗一首，要求研究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资料多是残缺的、零碎的，中国古史

① 《礼记·表记》。

② 后改名为《史林杂识》，中华书局1963年版。

上有些长期聚讼的疑难问题也多由于“文献不足征”。假如能适当地运用民族学资料于考古学或古史研究领域,无异为这些学科研究扩张大量材料。

有了这番认识,我对民族调查便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不再厌烦,而是乐此不疲。每当到一个民族之中,除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外,自己总要“种一点自留地”,搜集一些可能对研究考古学有用的资料。

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考古学问题,道理明确,不等于就能顺利进行,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经常是调查以后回到昆明提起笔来想写点什么时,却发现有些问题当时没有询问,不知详情,无法下笔,后悔不及。最后只能就事论事,作一些简单的描述,即使联系考古学问题也是浮光掠影,未能深入,因为所获材料有限。现在看自己最早写的东西,总是不免脸红。原来民族调查有自己一套方法,调查时应按科学程序办事,而我们民族调查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专业,并未受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以自己来说,在大学一年级上过《原始社会史》这门课,知道一些人类学常识,而对如何进行民族调查可以说毫无所知。

当时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一起被划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中外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都成为批判的对象。而“无产阶级的民族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应如何进行调查呢?从没人作过指导。每次调查出发之前,领导谆谆告诫的是“随时注意改造思想”,“结合中心工作,为政治服务”,“不要违反纪律”之类,要我们多读马列的书。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几乎是当时调查工作者的“圣经”,人手一册。但靠那本书就能顺利进行调查么?记得当时也曾看过一份油印的调查提纲,不知是哪位专家或领导人物拟定的,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列出寥寥几个大的项目而已,后来几千万字的调查资料,大多数按此格式写成,并非偶然,因为这是统一布置的结果。

按照这样的要求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完成任务一点也不困难,因为没有人检查你的调查成果是否真实,是否真能“结合中心工作”。而要真能得到一些对研究考古学有用的东西,既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又无现成的格式可以照搬,靠这样概念化的野外调查是无法如愿的。

生性好奇,既然过去的“资产阶级民族学家”也做过调查,写过书,那他们是如何进行调查的呢?1963年和1964年上半年回到北京,这段期间给我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靠着中小学打下的英文基础,借助字典,泛阅了国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名著原文,等于自学一年民族学基础课,补学了基本知识,特别是调查方法的基本知识。而且中央民族学院当时几乎集中了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权威和著名学者,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傅乐焕、闻宥、马学良等等,得以不时请教,获益良多。

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资产阶级的”人类学和民族学遭受批判,这方面的书籍并未在中国大地上完全消失,是学者自己怕受批判而不敢沾边,并非有什么官方禁止阅读的命令。“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这方面图书还能借阅。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清规戒律较多,而且藏书较少。但上面说的一些老先生家中藏书还有保存,至少“文化大革命”前是如此。这里要特别感谢林耀华、傅乐焕、宋蜀华等等先生的慷慨帮助,我常从他们的书架上借走想看的书。傅乐焕

先生还曾送我一本德国人Julius E. 利普斯著的《事物的起源》<sup>①</sup>（后来我把它翻译出版）。林耀华先生借我的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的《人类学的询问和记录》一书，对我学会调查方法帮助尤大。读了这本书才知道调查工作原来大有学问，才知道剖析一个社会应该调查哪些方面，调查某一方面时又应询问哪些问题，原来前人早就准备好了全面的具体的调查提纲，而且对如何选择报告人和训练翻译，如何询问，如何记录，都有一套方法，前人早就总结出许多有用的经验。即文字记录也绝不是仅靠一个笔记本，而应该根据情况使用不同的记录形式（谱牒、日记、原文实录、表格……）。这本书一直放在身边，成为我调查旅途中的伴侣，直到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找到更新的版本才把它还给林先生。

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陆上还可以看到西方民族学书刊，很多外国人表示不能相信。例如，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E. Guldin）先生访问我时开始曾对此将信将疑，后来才把这一点写入他的《中国人类学逸史》<sup>②</sup>之中。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民族学书籍只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充满政治术语且材料陈旧的书，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民族学书刊在公私藏书架上网结尘封，少人过问。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总不会完全从世界上消失，而且任何时候“偷吃禁果”的人总是有的。

看了大批书刊之后，再回到田野之中，感到值得调查的问题实在太多，调查也变得容易起来。再回头看自己过去的调查简直是胡闹，浪费时间。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后，对过去调查过的问题重新调查，又会发现许多新的材料。

## 二

调查和发掘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田野工作，民族调查便是民族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自豪地认为自己毕生都在田野工作中度过，尽管没有做过一次发掘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末，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遭难那几年及居留国外期间之外，几乎没有哪一年例外。有时一年中有半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迄今为止，我几乎走遍西南大地，像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每个区走过不止十次，行走里程应以万计，接触过少数民族二三十种，结交了不少少数民族朋友，有些民族自己的集会也邀我参加。沧源曾有一个佤族朋友向我敬酒即兴编出一首歌，称我是“不是佤族的佤族”。我认为这是对我毕生跋山涉水艰苦地从事田野工作最好的肯定。

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比较起来民族调查似更为艰苦，特别是在我们从事田野工作的时代。今日年轻人下去调查，出必专车，住必宾馆，餐有美食，日有补助，我们调查时的交通和生活条件决非他们所能想象。

先说交通。以云南为例，当时仅有部分县城可通汽车，从县城去乡村一般是无车可坐的，全凭

① Julius E.利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

② [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229页。



双腿。由于老百姓家中缺衣少被，要深入基层必须自带行李，因此背着背包走路可说是当时调查者的常规交通方法。在有条件的地方能雇一头牛驮着行李，或随着马帮同行给点零钱把行李加在马驮之上，就会有幸福之感。而若骑马，当时会被视为“老爷作风”，回单位必遭批判，而且西南地区尽是山路，时有坠骑之危；加之这里少数民族习惯在马背上并不置鞍，只放一条垫子或毯子，马的脊骨与你的尻骨相摩擦，骑马远不如走路舒服安心。随着马帮走路，食宿都交给“马锅头”安排，途中和他们一起在露天吃“罗锅饭”，晚上和他们一起住“马店”，听他们讲故事，说“粗话”，谈各地风土人情，一切不用自己操心，对调查者来说是轻松惬意之事。若不然，县里派一位翻译或干部相伴而行，途中有人谈话，不会有迷路之虑，在当时也算一种“优待”。我最怕是一人独行，又要问路，又要自己解决食宿问题，一路都处于紧张状态，若遇险恶山路，无人援手，时有生命危险。有一次从巧家到会泽县，便险遭不测。1960年9月8日日记中有当时的真实记录：

8月30日搭货车去巧家，会见原副县长龙士林，了解彝族迁徙事，毫无所获。当地迄无客车与外地交通，想再找货车回会泽已不可得，留下又无事可干，不得已于4日晨循金沙江边山路步行，不意屡历险境，至今思之尤觉心悸。路宽不过尺余，上有沙石，且向外倾斜，稍一滑足便下坠江中。欲手攀崖壁，岩石久经风雨侵蚀应手而落。愈走愈怕，几至无法举步。险恶处手足并用爬行而过；或坐于路上两腿下悬，双手撑地而过。曾想爬上山顶另觅佳路，爬数十步即遇峭壁，退回原路时下望大江，更觉心惊胆战，深悔冒失。自思这样死去殊为不值，只有屏定呼吸，看准落脚点，确有把握再移步。如此行走两日，4日晚宿双河，5日抵蒙姑，宿小旅社，心跳极快，疲劳已极仍难入睡。蒙姑……为偏僻小镇，由于交通不便，完全保持原来面貌，风俗淳厚。白天去茶馆喝茶，众人见我狼狈不堪，精神委顿，前来问讯……有人请我晚上去家中吃饭，有人劝我多留几天慢慢想办法。还有人说：抗战期间一位外籍水利工程师为了勘测金沙江通航事，就走此路，后坠入江中。这使我毛骨悚然。

巧家为偏僻县城，自无班车与外界交通，而一些不算偏僻地区也是如此，例如有一次从下关到永胜整整花了四天时间：

永胜迄今不通客车，22日离下关，乘车至宾川（牛井）换马车前行，是日抵金沙江边而宿。23日晨渡江，有溜索，亦有渡船，任旅客选择。我选渡船，以为可以“轻松一下”。不意行至江心，船遇漩涡打转，船工头上冒汗，幸有惊无险。下午搭拖拉机继续北行，夜宿期纳，已属永胜县境。24日晨起，拖拉机竟弃众乘客而去，他未收车钱，有权如此。与众乘客继续步行，一路尚不寂寞。程海在望，风光宜人。……步行约20公里遇道班房而宿，见拖拉机亦停门前；拖拉机之速度竟与步行相伴。今日再乘拖拉机抵此，100公里路程，共行四日。（1962年9月25日日记）

今日从下关到永胜乘车数小时可达，而当时竟走四天时间，乘过汽车、马车、拖拉机、渡船几种交通工具，加上“11号车”（这是当时我们对走路的俗称），才到达目的地。

即使有车可坐，不要认为是什么舒服之事。人各一座的公共汽车当时是奢侈之物，仅从省城出发的班车才保证有之。偏僻地区即使所谓“定期班车”，实际上不过是“解放牌”卡车一辆，并无座位。乘客纷拥而上，各以自己行李放在四周背靠车板而坐，这便是舒服的“软席”。若未带行

李，只有“席地而坐”。下面几条日记便记录下了当时的实况：

5月30日由西昌到盐源，150公里竟走一天，夜深始达。此间客运仍用卡车，旅客以行李堆放四周为座位。司机之旁仅有之座，必须是当地重要官员或与司机有特殊关系人士才能占有。说及这一众所向往之座位，一位旅客大摆“龙门阵”：解放初期木里藏族土司去京开会，经盐源去西昌，也只能乘这样卡车。为示优待，安排他坐于司机之旁，彼问明司机之职务、身份，竟曰：我如何能与此类人并排同坐，何不在司机头上再安一座待我？这样才合“规则”。众旅客大笑。（1960年6月15日日记）

11日由西昌至会理。今由会理至鱼杂，渡金沙江抵此，便进入云南境内。由此去昆明由云南方面来车接。所谓客车仍是卡车，乘坐极为难受。已行2天，还要再走3天。（1960年6月12日日记）

那次五天卡车旅行，我未带行李，只能坐在一张报纸之上。车底钢板又硬又凉，下车时双腿麻木，几乎不能举步。

这种作为定期班车的卡车至少还有帆布篷，可以遮阳挡雨。若在已通公路尚无定期班车的地方或途中搭车，便只有搭放空货车而行。要在路边耐心等待，要向司机卑躬屈膝说上一大套好话，才允许你手足并用从后面爬入车厢。记得去当时的基诺山，尽管景洪至勐腊公路横贯而过，仍无班车，每次必在小勐养等待放空货车，坐在傣族妇女卖物小摊前等候半天或一天是常有之事。汽车抛锚，固然司空见惯；而雨季公路突然中断，在车上过夜或折回原地也非少见。空车一般不带帆布篷，下雨便成为“落汤鸡”。

19日晨离盘县县城，在刘官屯等车，好不容易截住一辆放空货车。空荡荡车厢中只有我一人。原想享受独处之乐，直达贵阳。20日突然大雨倾盆，浑身湿透，不得不在安顺下车休整。21日改乘客车，原定半日即达贵阳，车到平坝抛锚，又住了一天。古人叹“蜀道之难”，今虽有汽车可乘，在西南地区旅行仍非易事。（1960年7月22日日记）

再言居住。调查应该尽量接近调查对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像有些国外人类学家那样携带帐篷吊床、睡袋甚至汽车房屋一套装备，可以住在调查地点附近而又有自己的空间，对当时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当时一般只能在小学、区乡政府，更多是在老百姓的家中，打开自己的行李，使自己晚上有个安身之地。

若在老百姓家中住宿，给你单独一个房间，或在火塘之旁与主人家的老人并榻，是很幸运的事。经常是与主人全家老少男女合住一室，床铺紧接：

今晚……住宿（沧源民良）老寨老五表兄家，他夫妻俩及小孩，加上今日新来之儿媳及我们2人，共7人合住一室。卧具不够，我受照顾，独得一条棉毯盖身，仍奇冷难耐。加之小孩哭闹，一夜未得好眠。（1965年1月27日日记）

这并非出于怠慢，而是他们草屋之内原不分隔房间的，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原来居住条件就是如此。睡在傣族的竹楼的地板上清洁凉爽；尽管牛、猪、鸡就在楼下，气味难闻，但比起睡在有些地方，这里可算“天堂”。有些偏僻地区的彝族，房屋只有一层，畜栏就在床铺之旁，在这样的地方即使住上一夜也会使你终身难忘：

连日所宿彝家，多为单层土房，顶覆木板为瓦，畜栏即在室内，相距床铺只有咫尺之遥。入夜则牛之鼻吸声，猪之哼呼声，清晰可闻，甚难入睡。忆前读《徐霞客游记》，提及彼曾宿彝家，亦是不分男女同居一室，一半养畜，一半居人。这种居住方式，300年来竟未稍有改变。……(1960年5月23日日记)

徐霞客的经历见于《徐霞客游记》卷五下《滇游日记》三，其地当在今滇黔边境，我去的地方则在今四川凉山。



笔者在调查西双版纳傣族时与房东全家合影

偶尔住入调查对象之家有利于“参与观察”，受苦受罪，理所应该。而旅途之中总应有较好住处，以便休整。但那些时代每个县城一般只有一个旅馆或招待所，像今天的“标准间”当时是没有的，若有，仅高干可以住入。一般旅客能在四人至八人一个房间中觅得一个床铺，尽管被褥多时不换，夜间“五鬼（虱子、跳蚤、臭虫、蚊子、老鼠）大闹”，都会感到满足。每当夜晚长途客车抵达宿站，跑步

去旅馆排队登记是一场体力的比赛。动作稍慢或客车晚到，便会有向隅之叹。协商之下，可能给你在走廊中加床或在别人床位下加个地铺，甚或与不相识者合住一床也并非不可能：

车逃生故障，抵达昭觉已是深夜。车站旁小旅社全部客满，协商后加设地铺席地而卧一宿，凉气袭背。(1960年5月14日日记)

14日离昭通，当夜宿黑石头，沿途停车修理，抵达已是半夜。晚到之车照例必遇旅店高挂“客满”之牌。最后服务员声明，为让大家都能住下，两个人合睡一铺。与不相识人同床，实难忍受，我宁愿坐以待旦。……(1960年9月15日日记)

云南当时还有些城镇，是没有专门旅社的，多在饭店楼上备有一张张地铺，以备旅客不时之需。我在云南邓川竟然遇到过这样一些事：

昨晚抵此，宿小旅社，条件更不如剑川金华旅社。入睡之前，只有我一人。一觉醒来，周围床铺已满，距我铺不远处，竟是一位白族中年妇女。闻过去随马帮走路住店即常如此，男女不分，数十人合住一室。盖荒山野外，首先要安排所有人都能住下，不能考虑“男女有别”，只要有屋顶可以蔽身，有火塘可以取暖，免遭露宿之苦，遑论其他？(1961年9月20日日记)

以后在其他地方，不止一次与几十人合住一室，但男女混杂居住之事未再遇到。

最后谈谈吃饭问题。民族调查原不奢望享受盛餐美食，至少要吃饱，保证基本营养，才有力气走路。但现已知道全是人为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几个月不见油荤是常有之事。

在成都已见供应紧张。著名“天府之国”，小吃店经常关门或“卖完”。由成都赴凉山沿途更觉困难，惟一不必排队抢购者只有面条。每天定量一斤粮票，可食面条5碗，惟辣椒太多，无法下咽，只能要求“免红”。面条上仅有一点“帽子”亦被免去，入肚全为面粉别无营养，终日饥肠辘



辘。(1960年5月14日日记)

晨起与(永胜县)兰遮村干部及群众告别,算清伙食费(每日1斤粮票3角钱)。陈××说:“你来天天喝菜汤,‘他鲁粑粑’没尝一个,‘油茶’没喝一碗,还要你钱,真对不起。”十几天来,确是一天两碗红糙米饭,一钵菜汤佐餐,有盐无油。……(1962年10月14日日记)

每天能吃上糙米饭还算幸运。旅途吃不上饭的事,也非罕见:

到达昭通城,天黑已久,饭店早已关门……其他旅客或回家或探亲访友,可以就食,而我晚饭无着,饥饿难耐。从小摊上购黄梨数个,请旅店服务员帮忙加工。她好心而慷慨,又加入土豆数个,合而煮之,汤酸梨涩,味道实在太差,胡乱填肚而已。(1960年8月15日日记)

6日晚再宿黄草,7日拼命赶路直达盐源,夜已深。沿途吃饭问题尤其难,自6月2日离盐源就为此大伤脑筋。必须在开饭时间(晨10时及下午5时)赶到有伙食团之处情商搭伙。沿途农户缺粮严重,有钱有粮票并不能找到饭吃。有的说:“过去你来我家就是客人,倒酒杀鸡给你吃也不会收你一文钱。现在一样没得,很对不住。”情溢于辞,令我惻然。这两天饥一顿饱一顿,常挨饿赶路。从盐塘动身时,从粮库中用粮票购黄豆一斤,请老乡炒熟,作为干粮,饿时边走边吃。悔未听老乡之言,放盐炒之,终日食此,口渴难耐,沿途不断喝凉水解渴。……(1960年6月8日日记)

我毕生难忘的一餐饭也就是在盐源附近山区吃的。一天,赶到一个农村干部办的伙食团,交了半斤粮票几角钱,坐等开饭。等候良久,一木桶饭抬了进来,有人为我盛上一碗,竟是带稻壳的米饭,吞咽一口,喉如刀割,花了很长时间才吃完这碗饭。至今想起,嗓子还有痛感。我至今弄不明白这是因为当时断炊太久来不及舂米,还是因为米不去壳可以多吃一点。至少这绝不是当地固有的饮食习惯,而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食物”。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还要忍受不清洁或不合口的饮食。在云南边疆地区,最麻烦的是让你品尝牛肠不洗和肉同煮的汤锅,以及各种奇怪的昆虫或小动物。下面是我在西盟佤族中遇到的一件事:

又访小马散合作社副组长等时,询该寨猎头奴隶诸事。谈话毕,与多人围火塘准备吃饭,一人突然持弩走出,在黑暗中时准房梁一射,硕鼠一只应声而落,主人急忙剖腹(但不去毛)放火塘中烧熟分而食之。女主人在盛满饭的“木拉”中以老鼠腿一只插入递我。我婉拒,主人及众客皆不悦。正感无可奈何,进来一人,有饭而已无鼠。急中生智,迅速将老鼠腿插入他的饭中,说“是你的面份”。大概合乎“阿伍礼”,众人大笑。我终免吃老鼠之苦。(1965年3月22日日记)

此外,在少数民族家中喝酒也并非愉快之事,而是一种折磨。

此间(指西盟)调查工作较沧源更难。选定的报告人几乎无日不醉,尤以岩搜为甚。每天拉我喝酒,否则就是“心不好”。酒盛于竹筒中人喝一口,依次传递。水酒度数不大,不致醉倒。但喝了半天,一无所获,终非长策。……

16日老寨有人结婚,往观。……说好我去只“吃糖不喝酒”。比至,晒台上已支锅两口,切肉待煮,酒坛环列,于是又强拉大饮水酒,喝至肚胀欲吐才放归。(1965年3月17日日记)

晚分别访问马散乡乡长岩龙及其父岩肯。……岩龙泡酒,强饮两大竹筒,肚胀难受。(1965年3月26日日记)

此间(指贵州雷山苗族)人士极为好客,劝酒甚殷,且有一套说词。他们一般先喝两杯,因为客人是“两只脚走来的”。糟糕的是我们这次是坐车来此,车有四个轮胎,应喝四杯。当人已半醉,家中姑娘又出来敬酒,称“姑娘酒”,如不喝,“姑娘害羞,会上吊的”。甚至人已离席,还要喝一杯,称“出门酒”。酒为市上买来之白酒,盛在饭碗中,虽不倒满,连尽数碗或十数碗,数量甚为可观。幸老吴为我解围,代饮不少,仍感头晕目眩,强力支撑,未出洋相。又行至一家,见妇女多人欢声笑语,正在聚饮。原来这几天正逢喝“姐妹酒”时节。悔不该伫立门前观望,又被强拉入内。我们略饮一口,赶快夺门而逃。(1987年3月5日日记)

无论如何热情好客总比不上不理睬要好得多。特别是无人陪伴独自一人初到一个村寨时,可能找不到食宿之处:

晨沿岷江步行至雁门乡政府,办完手续,开始访问。原约定回来即安排食宿,不料天黑归来,办公室仍紧锁双门,只有坐于门外等候。有人告知:“干部们开会去了。”无人理睬,直至深夜。幸有一位羌族青年(刘姓)打着电筒走夜路,突然发现了,携至其家住下,方免露宿街头之苦。(1960年4月22日日记)

当我坐在乡政府门外地上等候时,才体会到在人人熟睡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床铺可以伸展四肢是什么滋味。

不习惯的饮食,不能适应的生活习惯,语言不通,初到不为当地居民所接受,不能开展工作,在异文化环境产生的孤独感和寂寞感等等,都属于“文化震撼”现象,是世界各地调查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必然经历而又必须克服的困难。从事民族考古学的人何可幸免?但那些年在中國搞民族调查还要加上由于物质条件匮乏带来的上述交通住宿和饮食诸方面的困难,这是今日青年学子无法想象的。

### 三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是什么力量支撑自己一直坚持民族考古学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我时常回忆的问题。



凉山彝族巫师演示羊骨卜方法

为名为利吗?这类冷僻的研究工作,好不容易写出一点东西,究竟有几人阅读?能出多大的名?又能带来多大的利益?

为了谋生吗?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自己算在高等学校中有了安定的工作,教书以外坐在家中随便做点研究,不必耗精费神,即可安稳地度过后半生,何必还要千方百计争取一切机会下去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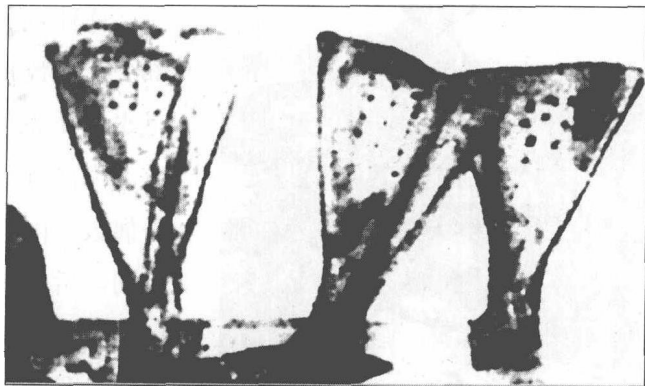
今日想来，支持自己毕生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兴趣，就是想将头脑中的疑问求得解答的愿望。当你调查有获，久思不得其解的某个问题豁然冰释，或者发现意想不到的新鲜材料，那份愉快和兴奋实非语言所能形容。这时，调查中所受之苦便会一笔勾销。

下面只是一些例子，也可以算是自己研究工作中“得意之笔”。我辈这一生不可能有什么轰轰烈烈大事可供回忆，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曾有过什么“辉煌”。而下面这些发现带给自己的愉悦，却是终身难忘的。

### （一）羊骨卜

中国远古文化遗存经常发现卜骨，其占卜方法迄今未能作出很好的复原。当看到西南好几个民族仍然会用羊肩胛骨进行占卜时，似乎使我一下子回到了远古时代，看到古代“贞人”是如何行卜的。

最早是1960年在凉山布拖县彝族之中发现这一习俗的。当时还没掌握正确的调查方法，未能记录下太多有用材料。1962年在云南永胜县调查他鲁人，请巫师表演其全过程，始知很多细节可与《史记·龟策列传》相印证。如祷祝要备祭品，他鲁人撒米，《龟策列传》记载古代用“梁”和“卵”。又如祷祝词之结构，两者都是先颂扬占卜材料之有灵，次言卜问之事，再言吉或凶各出何种卜兆。又如卜兆部位，两者都有“天（上）”、“地（下）”、“主（内）”、“外”之类名称，等等。《龟策列传》这篇文章在《史记》中自来视为“烦芜陋略”、“言词最鄙陋”，难以卒读，调查之后就能释其十之八九。原来其中除杂七杂八地叙录占卜的掌故、著名的卜者和卜例外，还记录了像他鲁人占卜前念的祷祝词，又包括像纳西族占卜后用以验兆的卜书，而且应是两部卜书合抄在一起的。《龟策列传》虽是记载古代龟甲卜的情况，龟甲卜与远古骨卜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而远古骨卜与西南民族骨卜之俗无疑属于同一类型。



凉山彝族巫卜骨

特别是卜兆出现之后巫师用黑灰在其上涂抹一番使裂纹清晰显露，使我懂得古代占卜“史定墨”<sup>①</sup>、“史占墨”<sup>②</sup>的“墨”字确切含义，原来“墨”就是用黑灰显兆，然后由负责占卜的“史”来决定吉凶<sup>③</sup>。几千年来聚讼未决的问题可由此得到确解，何快如之！

以后每到羊骨卜曾经流行的地方，便继续进行调查，积累了很多材料。最后一次是1985年10月在西昌，由最熟悉彝情的前彝族土司岭光电先生作报告，彻底解决了我脑中的疑问。这些问题也

① 《礼记·王藻》。

② 《周礼·占人》。

③ 《他鲁人的羊骨卜》，见《汪宁生论著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是甲骨文专家时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同一件事要问多少次？为什么甲骨有成坑埋藏的现象？

“卜”字像卜兆之形，而“卜”字之音是否来源于甲骨烧裂之声？（调查中有时未闻裂声，乃因卜骨未干）等等<sup>①</sup>。

调查结束前我把学会的占卜方法像一个彝族“毕摩”一样在岭光电先生面前从头到尾做了一遍，看自己是否真正掌握，最后他说：“行了，你如果会说彝话，也可替人烧了，得喝酒了。”

## （二）数卡

八卦是中国古代文化一套独特的符号，在社会生活很多方面留下烙印，它的来源常使文物考古工作者困惑不解。



他鲁人巫师演示羊卜方法



凉山彝族演示数卜（“雷夫孜”）方法

在凉山彝族调查羊骨卜时，发现他们还有一套数卜法，可以有助于解开八卦这个难解之谜。

这种占卜的要点是巫师用细竹或草秆一束，随手分去一部分，再数其余部分，看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此共行三次，可得三个奇偶数。或取一根树枝，以小刀随便划上许多刻痕，再任意分为三部分，细数每一部分之刻痕，亦可得三个奇偶数，由于数分两种而卜必三次，故有八种可能的奇偶数排列。后来又参考了前人调查材料，知道了凉山彝族过去人问“打冤家”时根据八种奇偶数排列情况以定吉凶的方法。因此，我认为八卦就起源于古代数著草占卜的筮法的八种奇偶数排列。每卦三爻，即包括三个奇偶数，阳爻为奇数，阴爻为偶数。最初的“画卦阶段”只有八卦，到了“重卦”阶段，才有六十四卦<sup>②</sup>。

多年之后，周原甲骨上发现了数字组成的符号，张政烺先生联系传世铜器及殷墟甲骨上同类符号，进一步论证八卦是奇偶数组成的符号，证实了我的推想。关于八卦起源的解释和上述对骨卜的研究，不幸早逝的张光直教授称为中国考古学上运用民族学资料的“最好的例子”<sup>③</sup>。

## （三）大房子

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出土不止一处大型房屋遗址，对此讨论颇多，多释为“母系大家庭公共住宅”。

① 参见《彝族和纳西族羊骨卜》，《汪宁生论著萃编》上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参见《八卦起源》，《汪宁生论著萃编》上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张光直：《考古工作者要熟读民族学》，载《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5页。